



## 长篇小说

## 转折时代的叙事艺术

□刘诗宇

◆2025年是长篇小说的“大年”。这一年的长篇小说在重大主题叙事方面作出具有前瞻性

的尝试,关于日常生活的书写也变得更加深刻,“纯文学”与类型叙事之间的壁垒逐渐被打破,

为读者提供了越来越不可替代的情绪价值

◆文学的发展面临转折与挑战时,我们除了寄希望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应该从文学自身寻找希望;文学评论与研究的意义亦系于此,应该在“新大众文艺”与“大文学观”理念的指引下,在叙事艺术的层面上帮助长篇小说寻找突围的路径

2024年,图书市场销量波动与一些老牌文学报转型,让我们不得不发出关于文学的“生存之问”。2025年,一边是余华、苏童、刘震云、贾平凹等作家纷纷推出新作,这是毫无疑问的长篇“大年”;另一边则是文学出版市场仍在收缩,每一个文学人的心头,或许都被这样的疑问萦绕——文学无疑会长久存在,但它还能继续生长吗?

2019年我第一次撰写长篇小说年度综述,当时写这篇不大不小的文章除了没什么焦虑感,除了努力寻找文学史层面的学术性和问题意识,更多的是在“追赶”文学现场——综述与否,文学现场都一样热闹着。

而今天情况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我们感觉文学进入“危急存亡之秋”,有了未来向何处去的困惑,对一年长篇小说创作的综述乃至任何评论、研究,也就不再只是对现场的“追赶”,而有了“介入”的意味。

也就是说,文学的发展面临转折与挑战时,我们除了寄希望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应该从文学自身寻找希望;文学评论与研究的意义亦系于此,应该在“新大众文艺”与“大文学观”理念的指引下,在叙事艺术的层面上帮助长篇小说寻找突围的路径。

## 重大主题叙事如何可读

《大海风》也从清末写起,至抗日战争结束,也选择了航运史这样一个并不常见的切入点,在海洋文明和民族复兴之间寻找交集。祝勇的《国宝》以故宫文物南迁写抗日战争,文物承载的历史与文化和战争的烽火交融,有效丰富了抗战叙事的层次。王尧的《桃花坞》、温燕霞的《破阵子》、王松的《橘红》也从知识分子、文化、曲艺等角度写抗战时期的风云。次仁罗布的《乌斯藏风云》以“凉州会谈”和佛教文化写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毕淑敏的《昆仑约定》、张者的《天边》以边疆人民的青春与爱恨写一代建设者的奉献精神。范小青的《江山故宅》、路内的《山水》以古建筑和汽车的视角进入近现代史。杜万青的《青烟》从乡绅阶层的命运与财富的变迁透视乡土社会。

将视野扩大到历史题材之外,情况也是近似的。宁肯的《冯所在》用命运跌宕的数学家形象折射中国科学发展史,柳岸的《天下良田》以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书写中原农村的山乡巨变,何常在的《向上》从“90后”创业者进入雄安新区建设,秦北的《掌心》从常识之外的信息技术博弈写中国科技与产业发展。总而言之,2025年的长篇小说让我们看到,当“正面强攻”很难平衡重大主题的意识形态价值、美学价值和市场价值,寻找更加独特、巧妙的切入角度可能意味着更宽广的表达空间。

## 日常叙事如何深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以“新写实小说”潮流为标志,“纯文学”出现了向日常生活收缩的趋势。写日常生活当然充满“合法性”,但问题在于小说的题材、趣味、情感与思想随之出现的窄化、细化、僵化与平庸化,让文学逐渐变得“无趣”。这种无趣当然不是指作品不够抓人眼球,而是指翻开一本小说前读者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花费了时间和精力,到底能获得什么?这种获得不只包括情绪上的满足,更指向文学能否以可接受的形式,让人们对于现实与人生的认知水平有所提升。

这一来年的长篇小说中,出现了一些对这个疑问有所回应的作品。

比如《咸的玩笑》中,刘震云用他那数十年不变的延津、小人物、幽默讽刺、孤独感,写出了社交媒体与短视频时代“网络暴力”的恐怖和“社会性死亡”的无奈。主人公杜太白生活中的三个小误会,在互联网上不断被扭曲、发酵,每一个为此慷慨激昂的网民都觉得自己是正义的,但他们的行为却让一个“罪”不至此的人众叛亲离,在精神和社会层面被彻底否定。近年由“网络暴力”导致的事件层出不穷,这种“社会性死亡”的状态也无视穷富、老幼,《咸的玩笑》充满当下性与问题意识,写出了能穿透阶层与身份差

异的故事与经验。

更有意味的是,小说并未止步于问题表层,主人公面临困境和孤独时的痛苦挣扎与自我排解都被描写得入木三分,作品因此浮现出了哲学意味——我们是否能为自己的选择充分负责?我们的选择又是否可能带来理想的生活?在随和诙谐又感人至深的叙事中,《咸的玩笑》能为日常生活带来治愈与启示。

说到阶层与身份的差异,东来的《凤凰籽》也值得关注。这部作品写一个贫苦的乡村少年,因一场交换家庭的“真人秀”来到大城市生活并改换命运的故事。《凤凰籽》用冷静、节制的笔触将主人公面临乡村与城市、基层与中产之间的差异时的卑微、委屈、不甘刻画得相当生动;而这种“换命”主题的意义,一方面在于提示我们阶层差异在物质与精神层面的真实存在;另一方面,它或许也解释了我们现在经常会有的困惑——为什么我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却总是感觉不快乐。答案或许就在于,从广播时代、电视时代再到互联网时代,“别人的生活”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技术带来的生活水平提升又进一步使人自问,那些“更好的生活”为什么不可以是“我的生活”。这可能已化作一种无孔不入的焦虑感,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加剧着人们的自我剥削与自我否定,进而产生痛苦。

如何摆脱这种困境?刘汀的《生活启蒙》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和21世纪20年代两个时间段里刻画了一对父女形象,他们都在眼下尚算平顺的日常生活里躁动不安,不懈地向往着某种模糊不清的理想与远方。与主人公形成对照的是多个极具感染力的次要人物,他们的人生面临各种各样的难关与缺憾,而他们的共性则在于能用某种贯穿人生的执着甚至“执念”,去接受生活的残缺。小说告诉读者,对远方的追求不会有止境,所谓的理想生活状态也从来不是诸事顺遂、心想事成,而是人心被岁月磨炼出安于与一切共处的平静心态。

21世纪的文学还有可能启蒙生活吗?2025年那些关于日常生活的长篇小说,其实都在回答这个问题。比如陈彦的《人间广阔》,是在一场单元分房的闹剧中讨论到底应当如何面对人生的歧路与生活的困境。苏童的《好天气》表面上充满了视觉与感觉上的奇观,描写人们在因为污染而五彩缤纷的天空下不无乐观地度过春夏秋冬;实际上则是在城乡的变迁、郊区的消亡中,讲述人们如何接受意外与失去。孙惠芬的《紫山》写乡村世界中人们的精神困境,以及他们如何从中突围。石一枫的《一日顶流》写流量时代普通人的漫游与徘徊,贾平凹的《消息》、陈建功的《请在我在的时候爱我们》、朱辉的《万川归》、滕肖澜的《平衡》、阿措的《沧城》、陈鹏的《群马》、李停的《水在岛中央》、王柳云的《风吹起了月光》等作品,也都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背景下表达对日常生活的深刻理解。

朱苑清的《黑镜森林》用悬疑叙事的笔法表达对底层生活的关怀,谈波的《海边列车》用言情叙事写下岗潮之前的国有工厂故事……类似的例子可能还有很多,长篇小说创作出现的这种变化,意味着阅读体验的重要性已经浮出水面。今天的长篇小说需要让读者感觉“开卷有益”,但可能更需要确保读者有足够的心情“开卷”。

在这个层面上,有两部不那么像长篇小说的作品值得关注。

一部是朱山坡的《蛋镇诗社》。这本书的狂欢、抽象气质,让人在阅读的过程中有难得的“轻松”之感。之所以说《蛋镇诗社》不像长篇小说,

是因为它整体上由书信、评论、诗词甚至墓志铭等不同形式的文本“碎片”串联。然而仔细看,就会发现这些东西不过是取代了传统的场景、环境

类型叙事以及长篇小说的“情  
绪价值”

在延续自20世纪80年代的“纯文学”传统中,长篇小说作者一度不太重视,甚至有意排斥编织跌宕起伏的故事。然而90年代以来读者对小说的热情,或多或少缘起于武侠、玄幻、言情、恐怖、推理等类型叙事,它们最大的共性就是能提供让人手不释卷的阅读体验。

面对文学市场的收缩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快速发展,我们应该在“大文学观”的层面思考长篇小说的未来,应该意识到打通“纯文学”与类型叙事之间的障碍,在保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同时提升长篇小说阅读体验的重要性。

2025年的长篇小说对此有所回应。这一年出现了马鸣谦的《少年李的烦恼》等历史小说,马伯庸的《桃花源没事儿》等玄幻小说,梁清散的《开始的结束之枪》、流行歌手邓紫棋的《启示录》等科幻小说,呼延云的《鬼笑石》等推理小说。一直被归类为“纯文学”的一些作家,也开始在创作中采纳类型叙事的经验,以此平衡内容层面的“重”与阅读体验层面的“轻”。

刘亮程的《长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是一部能让读者对血缘关系与家族传承产生深刻理解的作品。有趣的是,作者写到有关亡者、灵魂的民俗场面上时,出现了仿佛恐怖电影的分镜感,这就使作品在沉郁厚重之余变得更具张力,提升了好奇、刺激层面的阅读体验。

李铁的《匠户志》也是一个例证。这部作品聚焦老一辈产业工人与吹花工艺,其主题充满价值但也很容易让当下读者产生隔膜感。不只《匠户志》,很多工业题材长篇小说在读者接受上的难题可能都在于此。于是李铁在作品中大量运用类似武侠与玄幻叙事的笔法,技工较量手艺如比武斗法,对于尖端工艺的求索仿佛参悟绝世神功,充满历史感的工业题材因此有了代入感与亲和力。

朱苑清的《黑镜森林》用悬疑叙事的笔法表达对底层生活的关怀,谈波的《海边列车》用言情叙事写下岗潮之前的国有工厂故事……类似的例子可能还有很多,长篇小说创作出现的这种变化,意味着阅读体验的重要性已经浮出水面。今天的长篇小说需要让读者感觉“开卷有益”,但可能更需要确保读者有足够的心情“开卷”。

在这个层面上,有两部不那么像长篇小说的作品值得关注。

一部是朱山坡的《蛋镇诗社》。这本书的狂欢、抽象气质,让人在阅读的过程中有难得的“轻松”之感。之所以说《蛋镇诗社》不像长篇小说,

是因为它整体上由书信、评论、诗词甚至墓志铭等不同形式的文本“碎片”串联。然而仔细看,就会发现这些东西不过是取代了传统的场景、环境

描写与务必遵循逻辑顺序展开的情节铺陈,一以贯之的故事和人物形象其实仍然存在。每一个文本“碎片”自成一体,颠倒顺序或从任何一个篇章开始阅读皆无不可;如果担心不能把握故事全貌,书中还有类似于年表的“干货”章节堪作指南。相比阅读传统长篇小说那种仿佛吃“正餐”,必须分出前菜、主菜、餐后甜点的感觉,读《蛋镇诗社》更像面对五花八门的“小吃”,这里没有那么多严谨的顺序与规矩,轻松的阅读体验也就由此产生。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我在形容《蛋镇诗社》的气质时用了“抽象”二字,这指的并不是艺术史上的抽象派,而是指互联网时代孕育出的一种介于恶搞、荒诞、解构之间的复杂美学范畴与话语体系。由此衍生的艺术作品在网络空间与青年受众之间蔚为大观,但文学界尤其是长篇小说写作对此还未有充分重视。

另一部是余华的《卢克明的偷偷一笑》。这部作品幅短得不像长篇小说,但它承载的问题颇有代表性。从《兄弟》开始,余华的每一部新作都会引起读者的争论,而到了这一部作品,读者却几乎“一面倒”地予以批评。原因何在?一方面,这部作品甚为简单的叙事、平直的语言与过去的余华形成“反差”;另一方面,读者的差评则可能与某种认知上的差异有关。

卢克明这个“混蛋”形象身上为人诟病的铜臭与声色犬马,或许并不全是夸张的虚构。甚至我们还可以说,面对近一二十年的社会现实,余华作为作家仍是敏锐的也是勇敢的。但读者对于卢克明道德状态的批判也不无道理,这意味着当下哪怕比小说荒唐百倍的社会新闻、短视频可以获得巨大流量,文学也还不能像它们一样“放飞自我”。读者仍然对作家、故事、人物形象有道德层面的期许,这种期许是浪漫的、理想的甚至超越现实的,这或许正是文学在互联网时代能带给读者的精神与情绪角度的价值之一。

谈到情绪价值,就不能不说刘楚昕的《泥潭》,这是2025年文学类图书市场最引人瞩目的“爆款”。刘楚昕在漓江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感言视频全网刷屏,尽管他对逝去女友的怀念与《泥潭》具体写了什么几乎没有关系,但人们还是被他的爱情与理想深深感动,这指向的正是文学在精神与情绪角度的价值。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读者因为作家本人的爱情故事而为虚构的作品买单,他们对作品究竟有何种预期?读者完成了掏钱买书的“金钱消费”之后,会翻开书本再完成“时间消费”吗?作为一个青年作家的长篇处女作,《泥潭》展现出了一些令人期待的质素,但其“一览众山小”的销量揭示的更是长篇小说乃至文学的市场接受正在进入新的阶段——读者对传统文学的消费正在出现盲盒化、象征化的趋势。这对于过往更多专注于内容的作家、期刊、出版社而言,都将是巨大的挑战。

该如何迎接这种挑战?“新大众文艺”与“大文学观”理念中蕴含着重要的理论启示。前者从创作者身份和艺术形式上,将关于文艺的讨论扩充到了一个新的广度;“大文学观”意味着文学必须看见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文化语境,看见那些过往不被我们重视的艺术形式、文化样态、接受人群中可能蕴含着何种动能,进而再创作、出版、传播、转化角度实现自我更新,以应对新的局面。

总而言之,讨论长篇小说、讨论文学,都在变得越来越有意义,也越来越有趣,因为我们或许正面临着一个对于文学而言前所未有的境况,而我们也将有可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文学。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发展研究处副处长、研究员)

文学名刊  
近作扫描

## 《西湖》《万松浦》《百花洲》《芒种》《民族文学》:

## 在突围中重返丰饶的自我

□李佳贤

现代化的迅猛推进带来经济的腾飞和更多选择的自由,但告别旧的樊篱,工具理性价值观、技术崇拜、日益细化的专业分工和考核制度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近期,《西湖》《万松浦》《百花洲》《芒种》《民族文学》等刊物中的不少作品,将笔触对准了现代人在职场和亲密关系中遭遇的新问题。

许多文学作品对现代职场对人的尊严与主体性的异化多有揭示和反思。黑铁的《咖啡》(《西湖》2025年第9期)中的文员马林在得知公司被合并、自己所在部门被撤后,深陷失业恐惧。他如惊弓之鸟般用咖啡讨好新同事,像契诃夫笔下的切尔维亚科夫一样陷入精神耗尽,小心翼翼地揣度上司的眼神、动作、话语中的弦外之音。在咖啡的刺激下,他的睡眠昼夜失调,惶惶不可终日。作家有意隐去姓名,用摩卡、拿铁、冰美式、爱尔兰等咖啡作为这些公司职员的代称,既写出了现代都市中人际关系的疏离和陌生感,也指向了工作对主体性的侵蚀。小说中公司职员的自由意志和个性,体现在对“续命”饮品咖啡的选择上,长期的文职工作者让马林下意识地只会用思维来思考,“不许在办公室摆放私人物品”的规定成为主体性被压抑的另一隐喻。小说结尾,当马林得知自己搞错公司地址的真相后,

荒诞和虚无感瞬间将其淹没。如果说马林的觉醒太过后知后觉,杨涛的《应聘》(《西湖》2025年第9期)中的冯斌则对自己疲于奔命的状态有着清醒的认识。但可悲之处在于,即便再如何清醒、如何想按下暂停键,他却仍不得不卷入忙碌倦怠而无意义的漩涡里。冯斌书桌上来不及撕掉塑封的海德格尔的书,正是现代人无法诗意栖居的隐喻。冯斌在充满变数、随时可能推倒重来的工作中,成为关系户应聘的“底层资源”和工具,这暴露出一些现代人劳动价值和意义感的缺失,也进一步带来了存在的虚无感和深层焦虑。张翎的《给袁陀螺开腔》(《百花洲》2025年第5期)中的三水因“嘴严”而成为校长的专职司机。小说借三水的视角,让我们看到身居高位的大学校长袁致信“像陀螺一般片刻不停连轴转”的高强度工作状态。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袁陀螺的精力被大量消耗在暗潮涌动的权力斗争、大大小小的会议、下属纠纷等事务中,工作的崇高感和价值感被琐碎消解。尽管袁陀螺与司机三水有上下级的分野,但工作中谨小慎微、极其紧绷的精神状态却如出一辙。一条朋友圈引发的风波,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现代严密的科层制中,不论分工如何,失去“位置”的焦虑和恐惧始终支配着每个人。尹学

芸的《那年的事》(《万松浦》2025年第5期)为我们呈现了主人公工作的意义如何被权力和媒体介入与重构。狱警原小青因被人抢功而对立功有了执念,女囚郝建芬成为她立功的突破口。郝建芬绝非恶人,却因厄运的捉弄,赔上自己和父辈的全部身家,最终沦为杀人犯。原小青虽立功心切,但起初主动帮助郝建芬只是出于恻隐之心。悲悯让原小青自掏腰包为郝建芬看病,在郝建芬被判死刑后还答应为其寻找亲生父母。狱警与犯人建立起超越工作关系的姐妹情谊。郝建芬的时间所剩无多,为其寻亲似乎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但原小青找到郝建芬的亲生父母后,他们早早赶到青年广场的公审大会,大会却因突降大雨而临时取消,郝建芬的行刑时间被提前,终究未能与亲生父母相见。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原小青的付出或许没什么意义,但超越功利的人性温情在“无意义”中满溢而出。身处不同囚笼和创伤中的原小青与郝建芬都得到了心灵的疗救,“无意义”的善举成就了最大的意义。当原小青的善举被单位和媒体发掘并赋予明确的“意义”后,工作的意义感反倒被稀释了。在荣誉的加持下,她俨然成为犯罪心理专家,游走于各类讲座中,分享修复犯人心理的独到经验,但却“几乎不再接触犯人”,虚无

感和负罪感最终将其推向绝境。此外,张元的《植物管理员》(《民族文学》2025年第10期)、胡淳子的《翻山》(《百花洲》2025年第5期)、王晏南的《看山不是山》(《芒种》2025年第10期)等作品均刻画了当代年轻人在水泥丛林和玻璃幕墙中的彷徨、无奈与焦灼的心态。

除了聚焦职场外,当下爱情婚姻等亲密关系的新变也引起了作家的思考。熊正良的《擦肩而过》(《百花洲》2025年第5期),采用现实和回忆交织的双线叙事,丸子在现实中失败的婚姻与回忆里“擦肩而过”的深刻情感形成鲜明对比。当本该坚固长久的亲密关系变得脆弱而易散,丸子只能将情感寄托在偶然交汇的爱的闪电里,深刻揭示出由高流动性带来的现代人的情感困境。洪放的《人鱼》(《百花洲》2025年第5期)从女性立场出发,打破了读者对俗套情节的阅读期待,当唐小念和王冉装扮为人鱼进行表演时,境遇相似的两个女性惺惺相惜,觉醒、理解和相互救赎取代了粗暴的道德审判和轻率的复仇。对于唐小念来说,真正需要被关注和保卫的是自我,而非婚姻本身。包光寒的《随风而去》(《百花洲》2025年第5期)采用“元小说”的写法,将主人公光寒因婚外情带来的焦灼心理投射在自己的小

说创作中,写下充满压抑感且热烈厚重的古典式爱情。但在现实生活中,光寒与年轻女孩N的婚外情却分外轻飘随意。“爱”指向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感受,道德和责任都被过滤剥离,随风而去。陈方也的《逃·Run》(《西湖》2025年第9期)借三个不同年龄段女性的出走故事,书写“当代娜拉”如何自觉、坚毅、清醒地出走,以独立的姿态对抗并疗愈原生家庭、职场、爱情和婚姻中的创痛。作为独立的经济个体,这些“当代娜拉”无需忧虑“走后怎样”的难题,爱情和婚姻也不再成为必选项。与百年前“娜拉”具象而根柢虚弱的出走相比,“当代娜拉”的出走更清晰地指向了对个人主体性的维护和坚守,这种姿态也映射了当下极为普遍的时代情绪。

面对这些新的挑战,我们或许无法像王族的《一只疯了的狼》(《民族文学》2025年第9期)那样逸出规范之外而获得自由,但阿传一家安稳踏实的烟火日常(林为攀《洗朝》,《万松浦》2025年第5期),与童年、自然、本真、理想或浪漫的重新连接(张元《植物管理员》,《民族文学》2025年第10期)等,都在提醒我们从单向度的生活中抽身而出,重返丰饶的自我。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青年教师)